

洋务教育与“中体西用”

徐启彤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清王朝统治腐败不堪,外国侵略者疯狂入侵,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致使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洋务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开明的官僚贵族,他们不像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那样因循守旧、妄自尊大,拒绝外来的一切新生事物。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封建统治。他们遵循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创办洋务事业,寄希望于封建统治,企图振兴清王朝,稳固其统治。

洋务教育就是洋务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末,洋务派如何遵循“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创办洋务教育的呢?在洋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中学”和“西学”以及“体”和“用”的地位有什么变化?洋务教育的这些变化产生过什么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试图从一个侧面来评价洋务教育,从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洋务运动。

最初创办洋务学堂的目的,主要是应清王朝外交方面的需要,培养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就说:“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①于是提议挑选“天资聪慧”的少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治元年(1862)奕訢再次奏陈:“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中国人讲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②在急需外语人才的情况下,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正式创办。接着又于1863年在上海、广州相继创设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当时均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堂。

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走富国强兵之路,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单纯创办外国语言文字学堂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把创办洋务教育与培养科技人才联系起来,与自强求富联系起来。同治五年(1866)奕訢在奏折中讲:“中国之宜谋自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③洋务派办教育从外交需要很快发展到“宜谋自强”为目的。后来洋务派还将创办洋务教育的目的概括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④将自强、人才、学堂三者之间的关系说得十分清楚。

洋务派所需人才,是能掌握军事技术和专门技术的人才,是懂得自然科学的人才,以便适应建立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和创办近代企业之急需。这些人才,科举制度下的旧式书院是无法培养的。于是继创办外国语言文字学堂之后,洋务派很快创办了各种水师学堂、武备学堂、专业技术学堂以及模仿西方学校教育体制的普通学堂。

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曾被顽固派指责为“师事洋人”,对此洋务派驳斥说:“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狙於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转因薪至其人,将来或可突过其人,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於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⑤这是很有代表性的几句话,很能反映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的目的。他们在承认落后的情况下,没有自暴自弃,甘于落后,而是力主学习西方之长,并望“发愤为雄”,以至赶上或超过西方。顽固派在指责洋务派时,还振振有词地强调救亡图存、立国之本无需科学技术,仅需“忠信”、“礼义”为尚。对这一荒谬理论,洋务派也理直气壮予以驳斥:“仅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橛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⑥这些观点有充分的说服力,既

批得冥顽不化的顽固派理缺词穷，又表达了洋务派创办学堂、学习西方科技的决心。

洋务派创办洋务教育，非但没有丧失民族自信心，而确有救亡图存、自强求富之目的。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文祥曾说：“今日之敌，非得其所长，断难与抗。”^⑦李鸿章则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⑧这里就有“师夷”、“制夷”之意。李鸿章在创设武备学堂的奏折中讲得更明白，他说：“我非尽敌之长，不能制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创办军事学堂是为讲究军事技术，培养军事人才，抗击外国侵略者，以“备国家干城御侮之用。”^⑨七十年代开始，洋务派以求富为目的，创办了各种民用工业，同时开办了各种专业学堂，重视实业教育，以培养实用科学人才，并望掌握西方“机巧之原”、“制作之本”，以发展工业企业。

洋务派创办洋务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及聘用洋人，是否打算受制于洋人呢？当然不是，这在洋务学堂创办之初，洋务派对此表述很多：希望“洞悉根源，遇事不必外求”；表示“将来即可自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声称他们“竭虑殚思……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⑩等等。可以看出，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采西学、用洋人的，并非有受制于洋人之意。

除了办洋务学堂以外，洋务派还注意采西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阅读，翻译西方科学技术原著。他们认为：“西人所擅长者测算之学、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勒有成书。经译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迹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⑪他们懂得只有广阅博览其科学著作，全面深入地掌握科学技术，才是富强的途径。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洋务教育的不断深入，洋务派已不满足于仅在国内开办学堂，要求打破樊篱，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这在我国教育史上实属首创。派遣留学生的目的，他们在奏折中讲：“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此中奥窾，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⑫是为“洞彻”“西人擅长之技”的“本源”，渐图自强。于是从1872年开始，曾四次派遣留学生去美国。1875年开始，曾三次派

遣留学生赴欧洲。1896年还派留学生去日本。在洋务运动期间由洋务派直接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就有二百多人。

我们从创办洋务教育的目的中不难看出，洋务派是为维护封建统治，以求清王朝的富国强兵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他们采西学是以维护“中体”为前提的。“中体西用”是他们创办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他们创办洋务教育的出发点，绝非屈从于外国的侵略，培养洋奴、买办，甘心情愿地从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教育，应该说洋务教育是与外国侵略势力妄图变中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目的相对立而创办的。

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在洋务学堂里，他们丝毫不放松对学生进行封建的传统教育，以维护纲常名教，效忠清王朝。洋务派十分强调学生思想不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要把洋务教育限制在封建传统的思想观念允许的范围之内。

洋务教育创办之初，“中学”的教育内容是十分强调的。李鸿章在开创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时，就规定学馆必须学习儒家经典，既聘西人教授外语，又需“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艺”，并规定学生学成之后，必须为“读书明理”之人，才能充当外交、洋务人才。^⑬上海广方言馆规定学生“每七日中以四日读西书，三日读四书五经，另延生员四人主讲”^⑭。除外语学堂外，其他军事、专业学堂都同样强调读经义，以加强忠君尊孔的传统封建教育。如福建船政学堂规定学生要读《圣谕广训》、《孝经》；天津水师学堂也视儒家经典为教学之根本，学堂规定：“教之经俾明大义，课以文俾知论人；淪其灵明，即以培其根本”^⑮；广东水陆师学堂则规定：“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⑯。可见“中学”在洋务学堂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培养学生之根本所在。

洋务派对留学生防范更严。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等在关于留学生出国“应办事宜”中规定：“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并要定期“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⑰洋务派最怕留学

生出国受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所以特别强调留学生应不受“异学”所左右。清政府派遣赴美留学生，均有监督对其“严加管束”，除规定教授“中学”的内容外，还需逢节“望阙行礼”，即按清朝礼节跪拜，以表示对清政府以及对“至圣先师”的诚敬。^{①⑧}

关于“中学”内涵和地位，洋务派多有论述。薛福成在陈述“励人才”时，对“人才”的标准作了解释：“道德之蕴，忠孝之怀，诗书之味”为体。^{①⑨}他所述“道德”、“忠孝”、“诗书”，即为“中学”教育。洋务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对“中学”的内容、地位阐述得更清楚了。他认为“中学”即旧学，就是中国经史之学，是指“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是一切学问的基础。他还对“中学为体”的思想有所发展，主张：“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②⑩}

尽管洋务教育以“中学为体”，规定“忠孝”“经史之学”才是造就人才的根本。但封建的旧教育中毕竟注进了新鲜血液，“西学”成了洋务教育的重要内容。随着洋务派视野的不断扩大，以及洋务事业的发展，对“西学”的需求更为广泛，洋务教育中“西学”的课程在不断增加。

洋务学堂创办之初，因外交的迫切需要而开设的外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很快被看作为学习“西学”的基础和工具，受到洋务学堂的普遍重视。原来外国语学堂都增设了语种，如京师同文馆开始设英语，后来又开设俄、日、法、德等语；上海广方言馆开设英语、法语；广州同文馆开始仅授英语，后来又增开东、法、俄语。随后创办的军事学堂和专业技术学堂均重视外国语课程，特别是英语。如福建船政学堂分别用英语、法语教学；天津水师学堂用英语教学；广东水陆师学堂则用英、德语讲授。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规定：“二等学堂之学生，需照章学习西文四年，方能挑入头等学堂”，而头等学堂每年均设有“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课程^{②⑪}。这个时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在洋务学堂蔚然成风，成为我国教育史上重视学习外国语的开始。

经过二次鸦片战争，对统治者教训最深的莫过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从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在建立军事工业、置办近代军事装备的同时，便陆

续兴办了一批军事技术学堂。七十年代开始，在求富的呼声中，出现兴办民用工业的热潮，陆续开设专业技术学堂。起初出于急功近利，洋务学堂主要开设练兵制器、制造技术等实用课程。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富国强兵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他们强调：“若不从根本上下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於实用”。^{②⑫}洋务派急功近利思想有所转变，不仅重视应用学科，也重视基础理论。于是声光化电、理工医农等课程成了洋务学堂学习的重点。不论是外语学堂、专业技术学堂，还是军事学堂都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

创办最早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增设了天文算学馆，学习自然科学的课程逐渐增加，包括算学、天文、化学、格致、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科^{②⑬}。同文馆还译著了不少基础理论的书籍，如：《格物入门》（丁韪良著），《化学指南》（毕利干译），《星招指掌》（联芳、庆常译），《化学渊源》（毕利干译），《格物测算》（丁韪良著），其他还有《算学课艺》、《星学发轫》、《电理测源》、《坤象究源》等近20种^{②⑭}，成为这个时期同文馆译著的重要部分。有些学堂还将其采用为教材。如早期创办的外语学堂上海广方言馆，在下班开设了算学、代数学、几何学、对数学、重学、天文、地理、绘图等基础课程^{②⑮}。

这个时期创办的专业技术学堂，迁涉到船政、机械、工艺、电报、医学、铁路、矿务、工程等专业，在所设的专业学堂里，自然科学科目占了很大比例。如福建船政学堂在1867—1871年期间所设课程就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孤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热学、音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②⑯}。

军事学堂，包括水陆师学堂和武备学堂，都很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一般均规定在学习基础理论课程的基础上，再作军、兵种课程。如天津水师学堂就开设有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八线、级数、重学、天文、推步、地舆、测量等基础课程。^{②⑰}

西学绝不限于自然科学和制造技术，西方的人文科学也随着“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而渗透到洋务教育中来了。京师同文馆就设有各国史略、万国公法、富国策等课程。天津中西学堂设有各国史鉴、

万国公法、理财富国等科目。当时的洋务学堂均逐步开设一部分人文学科。在翻译的外国书籍中,也逐渐增加一些西方政治、历史等人文科学的内容。江南制造局在此期间共译书160多种,其中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就有18种之多。京师同文馆所译书中也有《法国律例》、《公法便览》、《各国史略》、《公法会通》、《富国策》等多种人文科学书籍。

先进科学技术对洋务工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洋务派迫切需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增加西学课程。随着洋务教育的发展,西学的内涵和外延又不断伸展,西学的范围和科目不断增加。这样,洋务运动后期洋务学堂的西学课程和学习时间虽各不相同,但一般均占有80—90%以上^⑳。虽然此时洋务学堂也规定“中学”的教学,但中文教员多为“学究帖括”之流,所定课程无非是四书五经几部儒家经典,学生们多视为无用之学而成为赘疣。此种情况绝非个别,而带有普遍性,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所议的公文中讲得很清楚:“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㉑

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洋务教育,“中学”和“西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西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而成为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洋务学堂的主要课程;而“中学”却越来越被视为无用之学,成为洋务学堂中徒具形式的具文。

三

西学东渐,势如浪潮,冲击着封建王朝的陈规旧习,荡涤着人们僵化的传统观念。洋务教育改变了传统教育内容,同时也改变了“中学”、“西学”的地位。洋务教育的发展势必冲击陈旧的封建科举制度,以致使传统的取仕制度亦有所改变。

京师同文馆建立之初,就规定学生每三年由总署大臣考试一次,成绩优等者分别授为七、八、九品官,成绩劣等者则分别降革、留学;又规定“嗣后由同文馆考取七品官复考一等授为主事者,请仍准掣分各衙门行走,遇缺即补”。^㉒在同文馆学成之后,学生即可授予官职,以至分衙门行走、差使,这就不同于科举考试八股取仕方法,而是对科举制的一种否定和冲击。

同治五年(1866)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数学

馆,规定招收年轻的举人、贡生、翰林和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学^㉓。科举人员是读儒家经典、学封建伦理道德的,现在竟规定入洋务学堂,学习西方科学知识,还接受“洋教习”的传授。这无疑是对科举制度的挑战,动摇了人们传统教育的观念。

尽管传统的科举制度被洋务教育冲开了一个缺口,但随着洋务教育的发展,必然广泛涉及到洋务学堂学生的仕途、任用问题,这就要从整体上考虑改变科举制度的措施。在整个洋务教育期间,洋务派曾纷纷提出建议,为打破束缚,逐步改变科举制度,为洋务学堂学生争得仕途上的席位,而作过种种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1874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就对科举考试提出过异议,认为科举文、武两科考试,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建议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㉔。这一段话很能反映当时洋务派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和改变科举制度的主张。

这个时期对变通科举考试制度,设立洋务进取格的奏折为数不少。例如1870年闽浙总督英桂、船政大臣沈葆楨在奏折中指出:“船炮之巧拙,以算学为根本”,建议开设算学一科^㉕。1875年礼部再上《请考试算学折》,奏陈:“无论举贡生监及大员子弟,均准录取。”^㉖1875年李鸿章建论将自然科、算学科加入考试科目。1884年张佩纶奏陈武科改试洋枪,改写五经而试算学、兵书^㉗。1884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开设艺学科,奏陈:“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与考”^㉘出于统治阶级的陈规旧习,以上建议均未实现。

当然,洋务派主张开科取仕的建议并未就此而停止。1887年江南监察御史陈瑑莹上奏,建议将数学科列为科举考试科目,明习算学人员可以量予科甲出身。清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第一次将“西学”和“中学”同考^㉙。陈瑑莹还根据考试实际情况,主张对数学实在通晓者,应放松对四书五经考试的要求:“即正场文字稍逊,亦宽予录取”。^㉚四书五经已成了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障碍,理应受到冲击。戊戌变法前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礼部又采纳了贵州学政严修设立经济特科的建议。经济特科包括六经,即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㉛。

在洋务运动期间,封建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

内，增设了算学科和经济特科，这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大革新，是科举制度带有全局性的一次大变化。这正反映了洋务学堂创办后，中学、西学地位的变化，以及洋务教育对封建传统教育制度的冲击，这已波及到科举制度的兴废。

西学的传入，还不仅仅对科举取仕制度产生动摇，西学的内容，使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对西方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的了解日益广泛，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先进思想，也会随着西学的传播渗透到中国人的头脑中来，这很自然地对封建传统思想起分解作用。西学传播越广泛，封建的“祖宗成法”就越不行了。虽然洋务派一再声称，所变者“器”，“道”是永远不变的。事实上西学的“用”已经危及到中学的“体”，人们不自觉地提出“体”和“用”的统一。

这个时期，要求改变中学之“体”，以适应西学之“用”的呼声日益高涨。1880年由薛福成为李鸿章代拟的奏折中就讲：“创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不必事事拘守成法。”^①已有要求打破封建之“体”束缚的意向。九十年代更有人指责那些墨守成规、迷信“祖宗成法”的人们：“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治不立，而泰西所以治平者不专在格致也。”^②明确指出了中国落后的症结所在，不单纯是学西学、专研格致之术就可以解决的，关键是政治问题，矛头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即使是洋务派的大官僚，有的也掩盖不住对“中体西用”的指责和对西方政治的向往。对于洋务事业仅强调“西学为用”、限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他们指责为“遗其体而求其用。”^③对于洋务事业的种种弊端，他们归结为：“今中华不揣其本而未是求。”^④他们认为“中体西用”只能学其皮毛，而未学其根本，并表露了设立议院，确立西方政治制度的意图。其实洋务派此时已发生分化，不少人已成为改良主义者或倾向于西方民主政治了。后来改良主义者公开提出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兴民权，实行议院制，很快在全国形成一种思潮，发展成为戊戌维新运动了。

洋务教育本来是借“西学”来维护封建统治之“体”的，而洋务教育发展的客观逻辑却走向其反面，西学之“用”在中学之“体”内发生了吐故纳新的变化，自发地要以西方民主制度之“体”，来改变封建专制之“体”了。洋务教育发展到如此地

步，已远不是洋务派原来的意图所在，必然遭到清王朝统治者和洋务派头面人物的干预和反对。洋务大员张之洞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他在《劝学篇》中重申了洋务派办教育的思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强调指出“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中学凌驾于西学之上，而西学是为中学服务的。《劝学篇》对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作了危言耸听的阐述：“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把中学强调到如此重要的高度，无非是为了扬旧抑新，是为了扼制洋务教育的发展。《劝学篇》还对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兴民权进行攻击：“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张之洞的《劝学篇》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慈禧的赞赏，而他此时强调的“中体西用”已成了阻碍科学、教育事业发展和扼制戊戌维新运动兴起的思想障碍。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十九世纪末，洋务教育大约经历了40年的历程。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教育，从有利于学习西方文明，有利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开始，又以阻碍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扼制社会运动的兴起而结束。尽管这种教育受到种种限制和束缚，但毕竟是我国新型教育的开始，在我国古老的封建教育体系中，注进了新鲜血液，在我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争得合法的阶梯，从而使洋务教育打破了封建传统教育的一统天下；为我国近代培养了一批懂得科学技术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科举制度，为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型学制奠定了基础。同时洋务教育还对我国维新思想的孕育和维新运动的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洋务教育以其显著的进步意义而载入史册。

责任编辑 陈长荣

注：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7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7页，第23页，第25页，第33页，第24—37页，第158页，第160页，第22页，第10页，第26页，第209—211页，第207页。

④⑤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皇朝经世文新编》第六册，《学校》上。（下转第126页）

儒每裁抑之，道愍遂谤讼僧儒，逮诣南司”。^{⑤⑥}至于象南齐张岱“历为三府咨议，三王行事，与典签主帅共事，事举而情得”，^{⑤⑦}的例子实属罕见。

造成典签与行事权力相当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新即位的皇帝或昏暴无道，或才能平庸，政非己出，典签与行事趁机互相倾轧；第二是皇帝故意平衡二者的权力，使之互相牵制，以便从中操纵。例如，南齐永明八年，西阳王“子明典签刘道济取五十人役自给，在役子明左右船仗赃私百万”。齐武帝觉察后，“赐道济死”。同时，州府行事沈宪也因为“没有预先发刘道济罪状，被“免官”。^{⑤⑧}这表明典签与行事都有督察对方的责任，否则就被视为失职，一方有罪，两方被责。

纵观典签与皇帝、与诸王、与“行事”的相互关系，基本上可以明白南朝典签在都督府中的地位及其权力波动发展的特点。在整个南朝史中，典签基本上充当着皇帝的忠实走卒，常常为皇帝处理一些棘手的难题，替皇帝排忧解难。然而，由于典签对诸王实行极度的强控制，带来了物极必反的后果，一些出镇诸王因不能忍受这种控制，称兵向阙，这是皇帝派遣典签时始料不及的。至于少数典签，由于权力过分膨胀而被皇帝所杀，却是不足为怪和理所当然的。

责任编辑 徐启彤

- ①①①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之上《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史》216页，153页。
②《隋书》卷28《百官志下》。
③《唐六典》卷29《亲王府》。

- ④《宋书》卷39《百官志上》
⑤《后汉书》卷46《陈宠附忠传》。
⑥⑩王素《三省制略论》43页，57页。
⑦《晋书》卷39《荀勖传》。
⑧《资治通鉴》卷132宋明帝泰始四年。
⑨《南齐书》卷56《倖臣传序》。
⑫⑳《宋书》卷59《张畅传》。
⑬《宋书》卷94《恩倖传》。
⑭陈琳国《论魏晋南朝都督刺史》。载《北京师范大学》1986年第4期。
⑮陈琳国《论魏晋南朝都督发展中的三省制》。载《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史分册(一)》。
⑯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77—78页。
⑰⑱《南史》77卷《吕文显传》。
⑲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121页。
⑳《宋书》卷65《吉翰传》。
㉑《南史》卷25《张欣泰传》。
㉒《南齐书》卷40《庐陵王子卿传》。
㉓㉔《宋书》卷84《邓琬传》。
㉕《南齐书》卷42《萧堪传》。
㉖《南齐书》卷40《武帝诸子传论》。
㉗《宋书》卷79《桂阳王休范传》。
㉘《南史》卷44《巴陵王子伦传》。
㉙《宋书》卷79《海陵王休茂传》。
㉚《南史》卷43《长沙王晃传》。
㉛《宋书》卷69《刘湛传》。
㉜《宋书》卷72《巴陵王休若传》。
㉝㉞《南齐书》卷32《张岱传》。
㉟《梁书》卷33《王僧儒传》。
㊱《南齐书》卷53《沈宪传》。

(上接第114页)

- ⑦《清史稿·文祥传》。
⑧《洋务运动》(五)第120页。
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第42—44页。
⑩⑬《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第11—13页。
⑫《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32，第1页。
⑭《广方言馆全案》第51—53页。
⑮⑰《光绪政要》第五册，卷7。
⑯《清朝续文献通考》(二)卷109，学校16。
⑰《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2。
⑱张之洞等：《重订学堂章程折》，《奏定学堂章程》。
⑲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91页。
⑳《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二十四年刊。
㉑《上海县志续志》卷11。

- ㉒《严几道年谱》第4—5页。
㉓《洋务教育平议》，1987年第6期《史学月刊》。
㉔1898年《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
㉕《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㉖《沈文肃政书续编》卷上。
㉗《万国公报》第327卷。
㉘《洞于集奏稿》卷3。
㉙《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36页。
㉚《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4。
㉛《洋务运动》(六)141页。
㉜《皇朝经世文统编》第1卷。
㉝《盛世危言自序》。
㉞《盛世危言》卷首。